

首都博物馆从刊



13

一九九九年

21
13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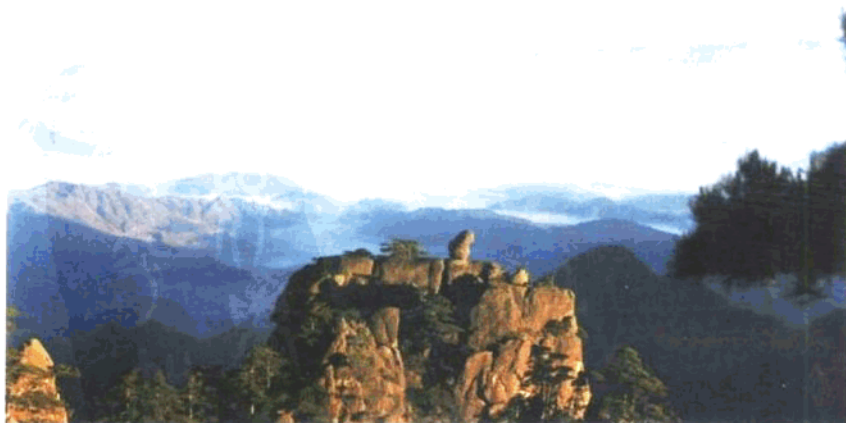
《我爱北京文物》翰海杯摄影比赛

一等奖 三彩独角兽(唐)



谷中秀摄

三等奖 猴子观海——黄山



梁刚摄

北京市文物局主办



复建后的山门



复建后的鼓楼



复建后的钟楼



复建后的东配殿及两侧厢房



图一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西直门，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京档案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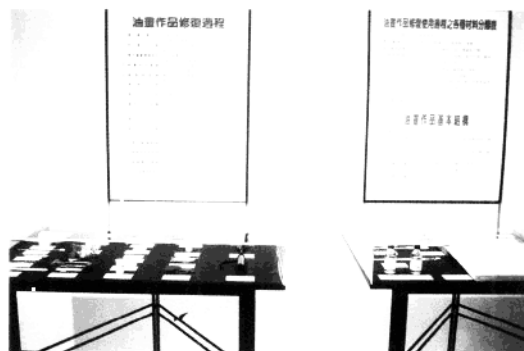


图二 解放军战士积极操练杀敌本领，准备攻打北平

图三 一幅油画修复的全部过程



图四 修复材料与工具展台



图五 金润作《桌上静物》棉布 61 × 50cm





图一 永定门瓮城内景，自北向南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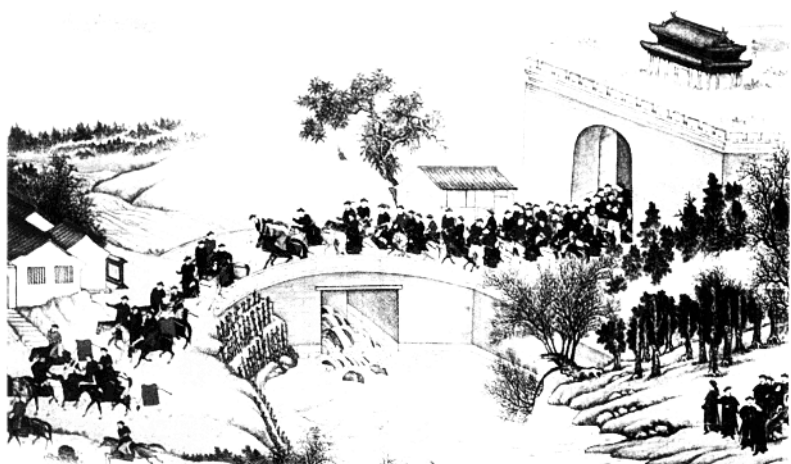


图二 永定门城门楼

图三 永定门瓮城



图四 清人所绘康熙南巡
出永定门瓮城图



首都博物馆 丛刊 第13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辽代燕京禅宗传播史实考述	黄春和 (1)
清代的嫔妃	齐 玫 (7)
略论李大钊对青年的指导和教育	刘谨桂 (14)
《北平和平解放若干史迹简述》补正	乐 薇 (20)
中国孔庙历史发展概况	姚秉正 (24)
试论清代包公戏及其重要意义	王政尧 (30)

古都谈往

琉璃厂文化街的新生	吴哲征 (37)
记北京外城永定门	张先得 (42)
白塔寺山门重开	孟 君 (44)

考古文物

从馆藏器物看斗彩瓷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	阎国藩 (48)
乾隆皇子墓出土玉器赏析	薛 婕 (53)

地方民俗

老北京的民俗与民俗文物	郭子昇 (56)
风筝·鬻人 ——老北京民间工艺之二	韩 英 (64)

《纪念北平和平解放 50 周年展览》浅谈	李铁虎 (68)
北京三千余年灿烂历史的见证	
——《北京历史文物陈列》续.....	葛建军 (75)
关于《北京历史文物陈列》中的展品及其组合.....	沈 平 (81)
油画修复在台湾.....	程 旭 (88)
谈博物馆的教育职能.....	沈 平 董艳梅 (95)
计算机与博物馆的现代化管理	杨 敏 (100)
讲解与艺术	董艳梅 (103)
台湾博物馆管窥	葛建军 (106)

翻译资料

牛津东方艺术博物馆藏中国早期青花瓷器	约翰·艾尔斯著 龙霄飞译 (108)
--------------------------	--------------------

附录

首都博物馆 1998 年大事记	(113)
-----------------------	-------

辽代燕京禅宗传播史实考述

黄 春 和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崇佛十分突出的一个王朝，曾出现了“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①的盛况。辽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奉不仅体现在兴建寺塔、造像刻经等功德事业上，而且对佛教思想也深感兴趣，极为重视。他们一方面深入经藏，探究佛理，同时还制订严格的考选制度，以促进佛教教学的发展。在辽帝的推崇下，燕京作为辽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佛学的发展盛况空前，宗派林立，高僧辈出，成为辽代佛学传播的重心。在当时流行的各教派中，最兴盛的是华严宗，其次是密宗，另外净土、法相、三论、律宗、天台、禅宗诸宗派也都有一定的影响，整体上体现出重视义理研究，轻视禅修实践的佛学风气。

禅宗是当时燕京流行的众多佛学流派之一，虽然传播不及教宗兴盛，主要流行于辽代初期和末期，但影响不可忽视，这主要是因为辽代末期有临济和曹洞两个派别的双双传入。这两个宗派传入后很快立稳脚跟，最终在派系和传承上成为金元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禅宗发展之源，在北京佛教史和禅宗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下面对辽代禅宗在初、末期传播情况略作梳理、考证，遗漏或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

辽初期禅宗传播主要继承唐代余绪，但发展较唐时已明显式微。传播踪迹有盘山感化寺和京西马鞍山潭柘寺。盘山是唐代禅宗弘传的重心，禅寺禅僧都集中于此，极一时之盛^②。可是到了辽代，史料里只留下智辛一位禅师在此活动。智辛，俗姓王，金台三河（今河北三河市）人。十五岁“愤悖违亲，礼创兹寺降龙大师门人彻禅师”出家。“精勤求法，夙夜澄神”。唐乾宁元年（894年）年满受具戒，之后游方参学。“访真侣于江南，礼名山于湖外”。“曾届青州”，“悉悟玄机”。其间还读大藏经，“明诸佛行”。通过真参实学，德业俱进，四众向其“问禅”、“请益”者不断。后返盘山故寺，重开法席。不久受请入燕京，驻锡崇国寺，参问者“往来如云”。辽应历元年（951年）坐化生西。火化后葬于燕城之北。应历二年（952年）于寺之东嶺“起塔供奉”。门人有崇德、崇信等九人^③。

潭柘寺位于京西门头沟区马鞍山脚下，辽初有从实和开龙两位禅师在这里活动。从实来自湖南，为曹洞宗二世孙，辽太宗会同年间（938～946年）抵于燕京^④。他曾聚徒千人讲法，影响甚大，后世以“潭柘”之名称誉他^⑤，影响非同一般。后示寂于华严祖堂，塔葬于山中。其塔在今寺西南五里莲花峰山腰处，因年久失修，早已塌毁。开龙禅师，名智常，活动时间在天禄年间（947～950年）。志书只记载他重建了潭柘道场，其余事迹均不详^⑥。潭柘寺在开龙智常之后屡经更名，景宗保宁年间（969～978年）名悟空院；圣宗统和十九年（1001年）改名万寿禅院；太平年间（1021～1030年）又改名华严寺^⑦。百年之间寺庙如此频繁地更名，这也暴露了寺庙宗风不振。

辽初禅宗的传播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陷入了长期的沉寂。它的沉寂来得十分突然，

分析其原因应有两个方面。其一，辽代佛学继承唐代的遗风，许多佛学大师都是来自燕云十六州的北方诸地，这些地区的佛学在辽以前便受到长安和五台山两个佛教重心地区的影响，注重佛学义理的研究和讲说。这一学风正好迎合了契丹统治者急于了解中原文化，学唐比宋的心理，因此不断得到统治者支持，得以迅猛发展。禅宗形成于南方，标榜“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其主旨和风格与注重义理研究的教宗大相径庭。这一相异的学风决定了禅与教互不相容的矛盾的存在。在唐代禅与教的斗争就十分激烈，到了辽代这一矛盾仍未消解，教宗占据明显优势后对禅宗采取了无情的排挤和打击。辽统和时（983~1011年）著名佛学大师诠明再定经录时，竟以禅宗根本经典《六祖坛经》为伪妄之作，不仅排在经录之外，而且“全予梵除”^⑧，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由此足见当时禅教斗争之激烈，亦可见禅宗被动的局面。其二，禅宗的教学特色不合辽统治者的口味。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强调主观内审，“见性成佛”。这一宗风和旨趣要求具备深厚根机的人才能修学禅宗，而辽代统治者不仅没有佛学基础，就连汉文化基础也十分薄弱，玄奥深邃的禅理和变化莫测的机锋是他们很难接受的，因此对他们来说选择说理性较强的教宗无疑是恰当的，不仅适合他们自己的兴趣和接受能力，也可起到辅助王权的教化作用。由上两方面原因可见，辽代禅宗陷入长时间沉寂与当时政治和佛教发展背景密切相关，它在教内孤立无援，在教外又得不到统治者的扶持，这样的历史背景注定了它的发展命运。

二

辽代末期，禅宗从南方宋地重新传入燕京，给燕京禅宗带来了复燃的火种，通过外来和本土禅僧的共同努力，很快在燕京大地上传播开来。当时南来的禅宗有临济和曹洞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是当时中原内地最有势力的两个禅宗支派。它们在燕京各有其代表人物和活动地点，临济宗以竹林宝、竹林安、通理、通圆、寂照等人代表，主要活动于城内竹林寺和大安山延福寺；曹洞宗以青州希辨为代表，主要活动于京西潭柘寺。

临济宗的传播以燕京城内竹林寺影响最大。《元一统志》、《析津志》对此寺均有记载，称该寺“始于辽道宗清宁八年，宋楚国大长公主以左街显忠坊之赐第为佛寺”，“古德海公所住，迄今宗门有录曰海西堂是也”^⑨。查考海西堂，在《临济正宗之碑》^⑩中列有他的名号，称海西堂容菴，为临济宗第十世宗师；在海西堂名号前，《临济正宗之碑》中还列有“竹林宝”、“竹林安”两位宗师。从海西堂与他们的师承关系看，这两人名号前所冠之“竹林”应为燕京城内的竹林寺无疑。竹林宝、竹林安和海西堂容菴生卒年均不详，好在竹林宝的第五传弟子海云印简生卒年清楚，他生于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卒于元宪宗七年（1257年）^⑪。以海云卒年为下限，按师长弟子30岁之概率推算，竹林宝和竹林安二人的活动恰好跨在辽金交替之际，也就是说辽时应有他们二人的活动。辽时有两位临济宗匠在竹林寺活动，可见竹林寺无疑是当时临济宗传播的一个重心。

与竹林寺同时，大安山的延福寺也是临济宗传播的一个重要道场，当时有通理、通圆、寂照三位禅僧在此活动。《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记载此寺禅宗的缘起及影响说：

“至康安二号，南宗时运，果有奇人来昌大旨。遂以寂照大师、通圆、通理此三上人捷生间出，□□中之龙焉。传佛心印，继累代之高风，□无胜幢，作不请文。俾祖光回照，□灯无味者，始自三师。玄风大扇，开迷云而显惠□；智□发光，没前疑而通后滞；潜资鞭

影，得法益者不记。圣教暨今，禅俊如林，洋洋于满周沙界，得法传心，濛濛乎名相莫拟，斯乃学□虽众厚其根本。唯三上人乃曹溪的嗣，法眼玄孙，为此方宗派之原，传心之首者矣。是知后学修进玄机激扣，咸有所归者，岂不□悉焉。”^②

由此知禅宗传来的时间、因缘和南来“奇人”与通理、通圆、寂照“三上人”同昌大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我们研究辽燕京禅宗传入时间与传来地域也提供了十分可靠的依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通理等三人所传禅法的宗派，碑文也作出了交待。碑文说他们是“曹溪的嗣，法眼玄孙”，按字面理解应指六祖慧能大师的嫡传，法眼宗文益（885～958年）大师的第四传。但是联系禅宗法派发展的历史分析，说他们是六祖大师的嫡传没有疑问，但说是法眼的玄孙则不符史实。因为法眼宗自第三世永明延寿之后便开始衰微，到北宋中期法脉就已断绝。《中国佛教》说：“法眼宗为五家中最后创立的宗派，文益、德韶、延寿三世嫡嫡相传，在宋初极其隆盛，后即逐渐衰微。到宋代中叶，法脉就断绝，其间不过一百年。”^③由此看来，辽时法眼宗传入燕京是不可能的。笔者以为这个“法眼”所指应为临济宗第五世法演大师；“眼”应为“演”的一个别字。在辽代碑刻资料中，音同义不同的字相互替代现象十分普遍。如同一语句中“曹溪的嗣”的“的”字，按语意理解应是“嫡”字无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另外五祖法演与通理等三人的关系从时间上看也是基本相符的。从《临济正宗之碑》记载看，法演的玄孙为竹林安，我们前面按概率推算已知竹林安在辽末期有其活动，而通理等三人正是辽末期人，既然竹林安为法演玄孙，那么通理等三人为法演玄孙辈也就合理而有据。通理等人与竹林安既是同宗又是同辈，他们之间是否有关系呢？笔者暂时不敢断言。但是据南宋洪皓《松漠纪闻》中“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院”^④和《观音堂记》中“康安二号，南宗时运，果有奇人来昌大旨”两处记载分析，竹林和延福两个禅寺都与南来禅僧有关，它们在法脉传承上应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通圆和通理事迹《观音堂记》有记载，但都不甚详细，下面参考其它零星材料进行补充介绍。通圆（1049～1104年），讳法贲，俗姓郑，燕京良乡县南石村人。“生而神俊，性异常童”，“幼慕佛乘，志乐出家”。礼燕京开悟寺金刚大师为师，年未满便受佛戒。既而“登于学肆”，以华严为专攻。后“因倦学律，访寻山水”。后闻莲花峪胜迹，杖锡而至，通理也同时挂锡于此。“自屈此居，心坚志爽，唯务口学”，德业因此而大进。道宗皇帝闻其道风，宣请瞻礼，“特赐紫袍和通圆之号”。至天祚帝时又宣请为内殿忏悔主，并加赐“特进守太师，辅国通圆之号”。通圆因此而名声大振。后至京西紫金寺（包世轩先生认为此寺在今门头沟区西部山地间的田庄乡田庄村，已讹传为“紫荆寺”）。信众“步礼而来受忏灭罪者，日不减二十余万”；“五京三学龙象皆来奔凑”，求皈依者以千万计。乾统四年（1104年）因病而终，寿五十五。门徒遍布五京，达数千之众。其中受紫衣者十余人。灵骨舍利塔葬于本寺祖茔之中。^⑤

通理（1049～1098年），讳恒策，字开玄，俗姓王，上谷矾山县（今河北涿鹿县矾山镇）新安人。世袭农业，家积纯善。父名保寿，母刘氏，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三。“生有异表，幼而神俊。”七岁从宝峰寺崇谨出家，法名义从。幼岁以“百法为业”，十六岁时便能登堂宣讲。后来学习中观、唯识，“靡不圆通”。由此得到燕京城内永泰寺守司徒守臻大师器识^⑥，投之门下，受赐法名恒策。“自兹左右，扞衣无倦”。二十三岁从守臻得法。当时道宗皇帝皇太后闻其名，特“赐紫袍，号通理焉”。从守臻得法后，通理先至涿州开演大法，之后“杖锡孤征”，最后卓锡大安山莲花峪。在大安山，他“结茅薙草，宴居林下”，精进

弥勒，朝夕无倦，德业因此而大进，道风亦随之远播。“五京缙素响师道风者，若葵心向日”；道宗皇帝倾其德范，宣请为内殿忏悔主；后又赐封他“检校司空”，但他推让未受。四方缙素还纷纷请他出山讲法。他在燕城永泰寺开坛时，“五京缙侣闻风而至，龙象学徒日不减三千之数”^⑧，道誉之隆由此可见。大安八年（1092年）通理发起续刻石经，他与门人崇昱“结心相与”，共赴云居寺筹备^⑨。大安九年他“开放戒坛”募得银钱“万余缗”交给弟子善定具体办理。至大安十年“钱已费尽”，共刻成石经四千零八十片，经四十帙。天庆七年（1117年），他的另一弟子善锐见经碑未藏，恐有残坏，又与善定同议募功，于寺西南隅“穿地为穴”，以藏石经，同时亦将道宗皇帝赐银所刻石经一百八十片（大碑）藏于其中。穴上立塔，“刻文标记”^⑩。1957年夏佛教和文物部门根据天庆七年《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舍利塔记》中“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⑪的记载，掘开地穴，终于发现了埋藏八百余年的通理刻经，同时还发现了道宗刻经和金代刻经，总计达一万零八十二片^⑫。目前这批石经陈列于云居寺专辟的展室之中。睹物思人，古人的伟大愿力令人崇敬和钦佩！据前不久新闻媒体报道，在文物和佛教部门倡议下，这批石经将在1999年9月9日9时9分9秒——世纪之交的一个吉祥时刻重归地穴^⑬。

另据记载，通理刻经前后还曾活动于佛崖山、王家岛、银山宝岩禅寺。在佛崖山时，慧聚寺（今戒台寺）著名律僧悟敏曾亲往参礼并于通理“言下有省，豁然有所指归”^⑭。在王家岛时有僧人崇昱问禅于他，他向崇昱“授以达摩传心之要”^⑮。在银山宝岩寺，他曾继寿昌间满公禅师法席而为该寺之住持^⑯。以上三处地点唯银山宝岩寺知其具体所在，在今昌平银山上，其他两处一时难以确定。但从通理活动的行踪看，它们应在今北京西部山区一带。寿昌四年（1098年）通理圆寂，世寿五十，僧腊四十三。荼毗后“双睛不烬，颌齿犹存”。灵骨舍利分葬四处，各起灵塔供奉。一生度化弟子一百五十余万，其中“皇储以下及百官等八十余人，公主国妃以下等五十余人”，“善字训名上首学资一百余人，剃度门徒四十八人”^⑰。通理一生，著述甚多，碑文记载他著有《梵行直释》三卷、《记文》四卷及其他遗文。所幸的是他的一些撰著在房山石经和俄国所藏黑水城出土遗书中保存了下来。在房山石经中保存有他的两篇短文：《先师通理三制律》^⑱和《通理大师集金刚礼一本》^⑲。在俄藏黑水城遗书里有《通理大师立志铭》、《性海三制律》^⑳等。以通理师承、修学和弘法情况结合他的撰著看，通理的佛学修养是极其丰富和全面的，体现有禅宗、律宗、唯识、三论、华严等多个方面，几乎涵盖了辽代全部佛学流派，通理成功地主持了规模宏大的刻经事业应和他的这一广博的佛学修养密不可分。关于通理的佛学思想，笔者将另文专门讨论。

三

曹洞宗的传播以青州希辨为代表。希辨原为北宋僧人，后被掠至辽国，主要活动于燕京，他对曹洞宗传入燕京具有开创之功，堪称金元燕京乃至整个北方曹洞宗的鼻祖。

希辨（1081～1149年），江西洪州（今南昌）人，俗姓黄。出家后始参云门和临济，后从曹洞宗鹿门自觉得法。得法后又往沂州（今山东临沂）参礼芙蓉道楷禅师，得其印证和授记，为曹洞之正宗传人。不久受请住持京师（开封）天宁寺，举扬曹洞宗风，道法极盛，时人称他“天宁长老”、“青州和尚”。后返青州居普照寺。辽道宗时，青州为耶律将军攻破，希辨被掠至燕京。他开始住在潭柘寺（时称华严寺），以“戒行高古”为大众钦服，被誉为

“潭柘再来”。金天会年间（1123～1137年）退居太湖山卧云菴，既而隐于仰山栖隐寺。金天眷三年（1140年）复迁潭柘寺，旋即再隐仰山，以门人德殷续灯于万寿（皇统初潭柘受赐为大万寿寺）。皇统三年（1143年）退居医巫闾山。天德元年（1149年）示寂于仰山栖隐寺。希辨归燕后，足迹遍及北方各地，他大阐宗风，顿时刮起一股强劲的南宗禅风，使沉寂许久的北方禅宗重新焕发生机。他示寂后，金翰林学士中靖大夫知制诰施宜生亲为撰碑。他在碑文中说：“潭柘老人二百年后，放大光明，芙蓉家风，却来北方。薰蒸宇宙，岂其大事！因缘大胜，亦有数耶。教有废兴，道无废兴；人有通塞，性无通塞。师既来燕，潭柘寂然。师既往燕，曹溪沛然。人知寂然，而不知潭柘未尝去也；人知沛然，而不知青州未尝来也。若然则无碑亦无害，有碑亦无碍。遂为之说。”^①施宜生对希辨在燕京弘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所谓“师既来燕，潭柘寂然；师既往燕，曹溪沛然”。这样的评价足以看出希辨重振当时燕京禅宗的作用和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希辨的地位和影响从明正统时立于北京胜果寺的《曹洞源流碑》中可以看出更为清楚。该碑载曰：“佛祖源流，曹洞门庭，过去庄严劫千佛，现在贤劫千佛，未来星宿劫千佛，至七佛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下分五派：曹洞、临济、云门、汾仰、法眼。曹洞正传青原思、石头迁、药山俨、云岩晟、洞山价、云居膺、同安丕、同安志、梁山观、太阳延、按子青、芙蓉楷、鹿门觉、青州辨、大明宝、王山体、雪岩满、万松秀、雪庭裕、少林泰、少林遇、少林才、大学鼻，以上佛祖各有传法之偈。正统十一年春三月吉日。”^②由这一曹洞宗传承法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希辨在北京和中国曹洞宗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他将曹洞宗首传于北京地区，之后大明宝、王山体、雪岩满、万松秀递相弘传于燕赵大地，影响及于金元二百余年之久，他们的旁支影响则更广更久，他在北京曹洞宗传播史上具有无可争辩的首创之功，同时在中国曹洞宗的传播史上，他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宗师。

授法与希辨的鹿门自觉和为希辨印证与授记的芙蓉道楷都是曹洞宗的著名宗匠，在曹洞宗法脉传承上皆榜上有名。芙蓉道楷（1043～1118年），沂州人，俗姓崔。原来信奉道教，后从投子义青习禅，并从之得法。先后住安徽马鞍山、江西洞山、湖北大阳等地寺院。宋崇宁、大观时又先后住持京师净因寺和天宁寺。住天宁寺时，宋徽宗赐以紫衣和师号，他拒绝接受，遂被遣放淄州（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他结菴于芙蓉湖畔传禅，因此得“芙蓉”之号。他的禅风纯密，见地非凡，有“芙蓉家风”之称。^③门人弟子众多，以丹霞子淳和鹿门自觉尤为著名。这二人后来分别开法于南北两地，使芙蓉法脉演为南北两支，鹿门自觉即为北支的开创人。自觉（？～1117年），青州人。他先在京师和南方参学弘法，因曾住京师净因寺和襄州鹿门，故有“净因自觉”和“鹿门自觉”称号。晚年迁锡青州，授徒传法，道化极盛，形成道楷门下一个重要支系^④。由此可见，希辨能先后得到两位德高望重的宗师的授法和印证，足见他不是一般的宗门人物；他来燕京之后，能在当时北方义学鼎盛时期将禅宗推演开来，都应与他这一重要宗教身份和地位分不开。

注释：

① 《辽史》卷二十六《道宗纪六》。

- ⑨ 黄春和：《隋唐时期幽州地区禅宗的传播及其影响》，《法音》1994年第9期。
- ⑩ 《感化寺智辛禅师塔记》，《全辽文》卷四。
- ⑪⑫⑬⑭ 《元一统志》卷一“万寿寺”。
- ⑮ 《潭柘寺志》卷一。
- ⑯ 《释门正统》卷八。
- ⑰ 《析津志辑佚·寺观》“竹林寺”。
- ⑱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 ⑲ 苏天钧：《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1986年《北京史研究》（一）。
- ⑳㉑㉒ 包世轩：《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疏证》，《北京文博》1997年第3期。
- ㉓ 《辽史拾遗》卷十七南宋洪皓《松漠纪闻》。
- ㉔ 黄春和：《〈大安山莲花峪引延福寺观音堂记〉通理实行补考》，《北京文博》1998年第3期。
- ㉕㉖ 《崇昱大师坟塔记》，《全辽文》卷十一。
- ㉗ 《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全辽文》卷十一。
- ㉘ 《白带山志》卷六。
- ㉙ 黄炳章：《房山云居寺石经》，《房山石经研究》第88页。
- ㉚ 《北京云居寺千年石经将回归地穴》，1998年6月21日《北京日报》。
- ㉛ 《银山宝岩禅寺上下院修殿堂记》，《昌平外志》卷六。
- ㉜ 《菩萨本行经》卷下第十六纸，欲字函，现编号“塔下四”，《房山石经·辽金刻经》（一）第264页。
- ㉝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等二十七纸经板背面，覆字函，现编号“塔下六四六”，《房山石经·辽金刻经》（一）第92页。
- ㉞ 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全七册）第二册。
- ㉟ 《宗统编年》卷二十四。
- ㊱ 《湖北金石志》卷十道潜《塔铭》。
- ㊲ 《佛祖道影》卷三。

清代的嫔妃

齐 玫

一、概 述

清代的嫔妃，包括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所谓嫔妃实即封建帝王的妾侍。我认为位在贵人以后的常在、答应等，谈不上是帝王的配偶，只不过是供役使的侍者。清代嫔妃究竟有多少？正如民间所说的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这么多的嫔妃，其中有降有升，确无法统计精确。从这一点可见封建帝王生活的糜烂。嫔妃虽比不上皇后那样“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得宠的嫔妃亦对皇帝有一定的影响，况且嫔妃的人数如此众多，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很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二、清历朝嫔妃际遇

清代共有皇帝十二位，清入关前有两位皇帝，那就是太祖和太宗。

太祖有妃十三位^①，她们的命运各不相同，受太祖宠爱的，连其家人也被优礼；相反的，因罪被赐死。更悲惨的，则活生生地做了殉葬的怨魂。

元妃佟佳氏，名哈哈纳札青，塔本巴彦次女。据《清实录》记载，太祖未成帝业时，娶福晋佟佳氏，生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及皇长女固伦公主（下嫁额驸栋鄂氏都统公和和礼）。其中，皇长子褚英，在太祖建号前数月死去。官书上对此未做详细记载。《清实录》中载，顺治五年诸王、内大臣奏言，太祖长子亦曾悖乱，被置于国法，固褚英实以罪诛。说明褚英很可能因影响皇权被杀。可见，封建社会人性已被严重扭曲，皇帝为了自己的地位，连亲生儿子都在所不惜。

继妃富察氏，名袞代，莽塞杜诸枯女。生皇五子莽古尔泰、皇十子德格类及皇女莽古济格格。后两子都因罪被罢爵，不久病死。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因罪被杀，其它几个儿子及德格类之子邓什库等也被黜为庶人。儿子和孙子的命运如此，那妃子本人呢？从继妃的内心讲，她极力要讨皇帝的欢心，行动上对皇帝亦是关怀备至。据《清史稿》记载：“岁癸巳，叶赫诸部来侵，上夜驻军，寝甚酣，妃呼上觉曰：‘尔方寸乱耶，惧耶？九国兵来攻，岂酣寝时耶？’上曰：‘我果惧，安能酣寝？我闻叶赫来侵，以其无期，时以为念。既至，我心安矣。我若负叶赫，天必厌之，安得不惧？今我顺天命，安疆土，彼纠九国以虐天咎之人，天不佑也！’安寝如故。及旦，遂破敌。”^②但是，继妃的命运并不佳，天命五年，因罪被赐死，命丧黄泉。也因此，下葬的待遇都不同，“妃富察氏祔顺治元年二月，以大妃博尔济锦氏祔葬福陵，改葬妃富察氏于陵外，以富察氏在太祖时获罪赐死故也。”^③

大妃乌喇纳喇氏，名阿巴亥，贝勒满泰女。生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四子多尔衮、皇十五子多铎。据《清史稿》记载：“天命十一年七月，太祖有疾，浴于汤泉。八月，疾大渐，

乘舟自太子河还，召大妃出迎，入浑河。庚戌，舟次暖鸡堡，上崩。辛亥，大妃殉焉，年三十七。同殉者，二庶妃。”^④据日本传钞《三朝实录》记载，“大福金（指大妃）美丰仪而心未纯善，常拂上意，虽有机巧，皆为上英明所制。上知之，恐其后乱于国，预以书遗诸贝勒曰，我身后，必令之殉。诸贝勒以遗命告大福金，大福金不欲从死，语支吾。诸贝勒坚请之，大福金遂服礼服，饰以金玉珠翠珍宝之物，因涕泣谓诸贝勒曰，吾年十二事先帝，丰衣美食，二十六年何忍离也。但吾二幼子多尔袞、多铎幸恩养之。大福金于辛亥辰刻以身殉焉。”^⑤由此可见，清入关前，它的整个社会的发展仍处于极落后的状态。奴隶制的统治使大妃难逃残酷的殉葬悲剧。

妃博尔济吉特氏，蒙古国科尔沁贝勒明安女。天命二年，“上纳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女已六年。至是闻明安来，甲戌，上偕妃率众贝勒大臣迎至百里外富尔简岗与明安马上接见，即于其处大宴之。明安献橐驼十，马牛各百。丁丑，随上入城，上以礼优遇，每日设筵宴。间日则大宴焉。留之一月，明安辞归，赐以人四十户，甲四十副及幣帛等物，送三十里，踰宿而还。”^⑥可见，此妃子很受太祖的宠爱，连其父也得到太祖的优礼。

太宗有妃十三位。^⑦其中宸妃极受太宗的宠爱，以至宸妃逝去，太宗悲恸难当，昏迷不醒。每每经过宸妃墓前，亦恸哭不已。

宸妃，敏惠恭和元妃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寨桑女，孝庄皇后的姐姐。居关雎宫。崇德初年封为宸妃，很受太宗的宠爱。生皇八子，太宗为此大赦，“集文武群臣于笃恭殿，颁赦其文云，宽温仁圣皇帝制曰，自开闢以来，人君有诞子之庆，必须大赦于国中，此古帝王之隆规。今蒙天眷关雎宫宸妃诞育皇嗣，朕仿古制愿使内外政教所及之地，咸被恩泽。除十恶外，凡见在羈禁之人，一切诬误小过窃盗隐匿咸赦降之。……”^⑧正所谓爱屋及乌，妃子的母亲也被受封，“封妃母科尔沁小妃为和硕贤妃，赐仪仗。”^⑨崇德六年九月，宸妃薨。“上恸哭。卯时，抵盛京，入关雎宫，至宸妃柩前，恸哭不止。”^⑩“丙申，上居御幄不饮食者六日，朝夕悲痛。是日午时，忽昏迷，言语无绪，皇后宫妃及清王大臣惊惧，陈设祭物于神前祈祷。酉时，上方愈，稍进饮食。”^⑪可见，太宗对宸妃爱之深切。当时，辅国公札哈纳、承政曹海“因妃丧作乐，帝怒。解曹海任，夺札哈纳爵，禁锢。”^⑫

清入关后共有十位皇帝，其中世祖有妃十六位。^⑬世祖在位，特选汉籍女子入宫为妃，“实录顺治五年诏许满汉通婚，汉官之女欲婚满洲者，令报部。”^⑭如，恪妃石氏，滦州人，户部侍郎石申女，“妃以汉籍得在选中实特例也。永平府志世祖章皇帝稽古制选汉官女备六宫。户部左侍郎石申女及笄承恩赐居永寿宫。冠服用汉式。敕石申妻赵淑人乘肩輿入西华门，至右门下舆。入宫行家人礼。赐重筵，赐贮赏赉有加。”^⑮世祖此举意在笼络汉旗官吏，从而达到强权的目的。

圣祖有嫔妃三十五位，^⑯为清列朝皇帝之首。这或许与其在位时间最长有关。得宠的妃子不但在皇帝在位时受到礼遇，及至继位的皇帝对之同样尊敬。如，圣祖定妃万琉哈氏，“高宗时，岁时节腊，必迎入宫，赋诗献寿，称为盛事。”^⑰

世宗有妃六位，^⑱独优礼贵妃年氏。雍正三年十一月，“妃病笃，帝谕曰礼部，贵妃年氏，秉性柔嘉，朕在潜藩侍朕尽敬。于皇后前，恭谨小心，是以皇考嘉之，封为帝王侧妃。朕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悉能尽心，襄赞内治。体素病羸，于今三年未遑，药饵渐次沈痼。朕心深为軫念，贵妃可封为皇贵妃。礼仪依皇贵妃例行。”^⑲

高宗有嫔妃二十四位。^⑳每位嫔妃都是由下至上顺利地升迁，唯有惇妃因责毙婢使由妃

降嫔。惇妃汪氏，满洲正白旗人，都统四格女。乾隆三十九年封为惇妃。“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谕曰，昨惇妃将伊宫内使唤女子责处致毙，事属骇见。前此妃嫔内，间有气性不好，痛殴婢女，致令情急轻生者，虽为主位之人不宜过于很虐，而死者究係窘迫自戕。然一经奏闻，无不量其情节惩治。从未有妃嫔将使女毒殴立毙之事。今惇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且不足使备位宫闈之人，咸知警畏。惇妃即著降封为嫔，以示惩戒。本宫之首领太监郭进忠、刘良著革去顶带，并罚钱粮二年。其总管太监除桂元在奏事处，萧云鹏兼司茶膳房，每日在御前伺候，不能复至宫内，稽查伊二人著免其议罪。其王忠、王成、王承义、郑玉柱、赵得胜专司内庭，今惇妃殴毙使女，伊等不能豫为劝阻，著各罚钱粮一年。但其事究因惇嫔波累，著将伊等应罚钱粮于各名下扣罚一半，其一半亦著惇嫔代为缴完。所有殴毙之女子，并著惇嫔罚出银一百两给其父母殓埋。将此旨交总管内务府大臣，传谕内府诸人知之。”^④高宗为了维护自己的形像，采取了貌似秉公的处理方法。显而易见，在封建社会，妃子的地位虽然是普通百姓无法比拟的，但她们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张牌，享乐时玩玩，不用时打出去而已。

仁宗有嫔妃十二位。^⑤其中的安嫔，原为常在，“实录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命内阁学士毛谔，恭奏金册，晋封安常在苏完尼瓜尔佳氏为安嫔。”^⑥

宣宗有嫔妃十四位。^⑦其中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最受后代皇帝的隆遇，“实录光绪十三年丁亥正月庚申，礼部奏皇上亲诣，庄顺皇贵妃围寝如何行礼。奠酒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皇帝亲诣，庄顺皇贵妃围寝，行一跪三拜礼，奠酒三爵。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癸亥，谕本年朕二旬万寿庆典，宏开庄顺皇贵妃母家三代，允宜特示推崇以光盛典。原任巴里坤镇总兵凝德，原任通判百禄，原任笔帖式灵寿，均著加恩，追赠一品封典。灵寿之继子笔帖式廷惠，著加恩，赏给骑都尉，世袭罔替，用昭隆礼。”^⑧

文宗有嫔妃十三位。^⑨

穆宗有妃四位。^⑩

德宗有妃二位。^⑪清列朝皇帝中，德宗妃子最少（除宣统皇帝外）。而这两位妃子的命运也不佳。这两妃子是姐妹俩，姐姐瑾妃，妹妹珍妃。两妃子均因“乞请”被降为贵人，“实录光绪二十年十月壬申谕内阁，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闈，从不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庭，向称淑慎，是以优加恩眷，洊陟崇封。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惩戒，恐左右近侍，藉以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著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⑫德宗在位时，实际掌权者为慈禧皇太后。因此，即使两妃子（特别是珍妃）深受皇帝宠爱，进而与皇上亲近些，话语多些，然而这是皇太后绝不允许的，妃子怎能如此放肆，就因此也要小题大作，以示警告。实际上皇太后此举也是给德宗一个下马威。由妃降贵人这种待遇，虽是无辜，但更不幸的命运在等着珍妃，“光绪二十六年，各国师入京师，帝西狩，妃仓猝不能从，于宫中殉焉。”^⑬官书上记载如此，传说珍妃实为被迫害至死。可怜珍妃，只因受皇帝宠爱，得罪了皇太后，这一条就足以使她“以身殉帝”。

三、清朝嫔妃制度

嫔妃，作为历朝都不可缺的附属，清朝也不例外，她与整个清朝制度并存，相应地亦

有一套完整、严格的管理体系。从最初的册封，到衣、食、住、行，以至死后的待遇等等，无所不包，显示出封建王权专制统治的特性。

有关嫔妃的建置，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以后，典制大备。……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⑧

清代嫔妃的册封“至嫔为止”。^⑨其册封仪式，“封皇贵妃、贵妃，用册宝仪仗。封妃，用册印彩仗。封嫔，用册彩仗。命正、副使均与册立皇后同。皇帝不御殿，不设卤簿乐悬。太和殿设节案册宝印案。封嫔不设印案。宫内设案如之。又设香案于节案前，设拜位于其南。仪仗彩仗设宫门外。内阁礼部官自内阁奉册宝印，分置彩亭。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奉节，礼部司官前导，诣太和殿。奉册宝印随节以升，入殿陈于案。届时，正副使自丹墀东升东阶，至丹陛左，北面，大学士入殿奉节出。正副使跪，授节于正使。正使受，偕副使兴。内阁礼部官入殿举册宝印出，由中阶下，陈于亭。黄盖御仗前导，以次诣景运门外。正使奉节授内监。内监仪校接昇亭，至宫门外，内监奉节册宝印入，皇贵妃、贵妃、妃、嫔礼服迎于宫门内，候过随行。内监奉节册宝印陈于案，引礼女官引皇贵妃、贵妃、妃、嫔就拜位。不作乐，听赞跪，女官宣读册文宝印文。皇贵妃、贵妃受册宝，妃受册印，嫔受册。行六肃三跪三拜礼毕，送节于宫门内道右如仪。正副使持节复命如仪。次日，皇帝御内殿，皇贵妃、贵妃、妃、嫔行礼如仪。”^⑩册封宣读时，“则制其副”，“以纸制册，饰黄绮制宝及印如之，饰以黄绶。”^⑪

嫔妃册封所用册，“皇贵妃银质镀金册十页，每页重十五两。银质镀金线，每个重一两五钱。贵妃银质镀金册十页，每页重十五两。银质镀金线，每个重一两五钱。妃银质镀金册十页，每页重十四两五钱二分。银质镀金线，每个重一两五钱。嫔银质镀金册四页，每页重十四两六钱二分五厘。银质镀金线，每个重一两五钱。”^⑫所用宝，“皇贵妃宝，贵妃宝，均金质蹲龙钮平台，清汉文玉筋篆，方四寸，厚一寸二分。……妃印，金质龟钮平台，清汉文，玉筋篆，方三寸六分，厚一寸。……皇贵妃、贵妃金宝，用六成金四百两。妃金印，用五成金三百两。”^⑬所用册箱，“皇贵妃、贵妃册大小箱，杉木质，朱髹绘鸾凤文。箱架，椴木质，雕鸾凤云缎面。褥垫套衣用云缎面。余与皇后册同。皇后册小箱，高九寸，长一尺，宽六寸五分。大箱，高一尺三寸，长一尺三寸五分，宽一尺。枌木质，沥粉云凤埒金。箱架，高二尺一寸，方一尺八寸，枌木质，雕凤文朱髹埒金。各钉纯银什件镀金铁锁。钥匙箱，高七寸，长一尺，宽五寸五分，质饰如大小箱。包袱用销金云凤罗缎面，褥垫套衣用片金面，皆明黄色。线条线穗亦如之。妃用箱及包袱褥垫套衣用金黄色。嫔用红色，……余皆与皇贵妃册同。”^⑭

嫔妃分居东、西十二宫。东六宫为景仁、承乾、钟粹、延禧、永和、景阳六宫；西六宫为永寿、翊坤、储秀、启祥、长春、咸福六宫，“诸宫皆有宫女子供使令。”^⑮“贵人以上，得选世家女；贵人以下，但选拜唐阿以下女。”^⑯宫女子额数，“皇贵妃位下八名，贵妃位下八名，妃位下六名，嫔位下六名，贵人位下四名，常在位下三名，答应位下二名。”^⑰

嫔妃的服饰亦有定制，“皇贵妃朝冠，冬用薰貂，夏以青绒为之。上缀朱纬。顶三层，贯东珠各一，皆承以金凤，饰东珠各三，珍珠各十七，上衔大珍珠一。朱纬上周缀金凤七，饰东珠各九，珍珠各二十一。后金翟一，饰猫眼石一，珍珠十六，翟尾垂珠，凡珍珠一百九十二，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东珠、珍珠各四，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明黄条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吉服冠与皇后同。